



林氏

明清小說研究

增刊

《明清小說研究》編輯部

林 同

明清小说的审美观照

《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

主 编 盛 思 明
副 主 编 吴 圣 昔

顾 问 刘 冬
法律顾问 戴 福 康

编辑部地址：江苏南京虎踞北路12号

邮政编码：210013

明清小说研究	主办单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印刷单位	南京日报
(季刊)		文学研究所		印刷厂
1990年		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发行范围	公 开
(增刊)	出版单位	《明清小说研究》		
TS苏增第17号		编辑部	订 阅	自办发行

《聊斋》爱情描写的民族特色对当代小说及评论的启示	(144)
小中见大，遗貌取神.....	(163)
——谈谈《聊斋》对高晓声小说创作的影响	
爱情观更新的爬行与飞跃.....	(172)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比较之一	
珠联璧合，瑜瑕互见.....	(184)
——谈《聊斋》电影、电视剧改编中的得失	
心有灵犀笔自通.....	(192)
——谈《聊斋》对《红楼梦》的影响	
* * *	
首届《镜花缘》讨论会述评.....	(203)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研讨会综述.....	(213)
简论《吴三桂演义》.....	(223)
拓荒者的花束.....	(236)
——读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	
求实、完备、系统、创新.....	(245)
——读《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	
信息十则： (3) (48) (77) (143) (162) (183) (212) (235) (244) (252)	

漫 说 发 现

《明清小说研究》创刊宗旨曾概括为六个字：发现、开拓、深化。我是赞同的。我以为这六个字中的核心是发现。但俗话说：提出任务还要解决方法问题。所以，我想谈谈发现什么？怎样发现？从哪些方面入手才能算是发现的正途，而不是猎奇、拔高的邪道，这也许不无益处。拙见以为可从下列几方面考虑：

一、从文学史角度，发现非名著对产生名著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绿叶与红花，还是小草与鲜花，抑或是小花与名花。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并解释清楚文学史上的规律，各种流派体裁的形成与变迁，也才能给名著和非名著作出恰当的评价。以人情小说论，《红楼》和《宛如约》、《花月痕》、《浮生六记》等的“亲戚”关系，就很值得研究。

二、从当时社会背景来发现大量的非名著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认为几乎谈不上文学气息的某些晚清小说，如《林则徐演义》、《瞎骗奇闻》、《拒约奇谈》等等，不仅是人物扁平，千人一面，甚至长篇大论“维新”“救国”之道，令人昏昏欲睡，但是，它们却绝大多数都是类似我们延安时代的秧歌舞、枪杆诗，都跳跃着仁人志士的爱国之心，这些作品正是唤醒“睡狮”的“呐喊”，绝不能因为类似“标语口号式”就不屑一顾，一笔抹杀。耶稣就说：穷人的一个小钱比财主的成千上万的金银还宝贵。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发出如此爱国的呐喊，正是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与实践，其意义不应该一笔抹杀！

三、不断扩大视野，使宏观二字落到实处。前一向时明清小说研究论文中宏观这个词儿很时髦，有同志甚至为提倡宏观而大声疾呼、义形于色。但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些宏观大文中所提到的作品，统统加起来只有三、四十部，而明清小说，仅就通俗小说而言，就有一千一百多部，这个百分之三四的入览作品只能说是明清小说的一个难具代表性的“斑”，实在窥不到明清小说的全豹。因而，扩大视野，多涉猎些非名著，多发现些明清小说的“森林”，是真正想搞宏观研究的必由之路。

四、可以从众多的非名著的比较（当然，也可与名著比较），发现它们的特色。埋没的珍珠固然要发掘出来，就是烂苹果也可以酿酒，何况那烂苹果上说不定还有美好而特异的基因；日常物事，工业产品能变废为宝，废中取宝，文艺作品也未尝不可。一概排斥，虽未必是倒脏水连孩子倒，但的确是“俯仰随人亦可怜”，就不可能超越前人，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五、努力发现稀见作品的生命力，为抢救遗产、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良好的借鉴。文学作品湮没，固然有物竞天择、历史长河自然淘汰的因素，但不少并非如此。作家穷，好书无法刻印，统治者扼杀，战乱，回禄等等，都可能使好作品变成海内外孤本；或断简残编，在鼠蠹的口下形销骨立；或“头在曹营身在吴”；《明清小说研究》发表的《清夜钟》就是例子。研究者发现它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是“毒草”，“看了要死人”的，也不能“肉体消灭”，而应该研究，象清理、保管好档案一样，将它们弄弄清楚，并从而得到教训。此点，对有识之士来说，实在应该优先考虑。当然，抢救、整理、研究、总结决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

素。

六、有志研究明清小说的同志，不妨从身边所搜罗到或不太费力就能得手的作品做起，搞清它的作者、创作目的、成书年代、版本、特色等等，方便而有实效。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不同的地方的同志，不同渠道来源的书籍，不同角度的考虑，就可以有更多的不同的发现，从事研究者事半而功倍，明清小说研究园地将因之更快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新局面。

七、再有兴趣不妨研究研究明清小说对当代小说的影响，如象《明清小说研究》1888年第1期刊载的《小中见大，遗貌取神》一文，谈《聊斋志异》对高晓声小说的影响，毋庸置疑，鲁迅、茅盾、巴金等可以说无一不受明清小说的影响，这方面真是大有文章可做，写若干部专著也可以。

八、不仅扩大自己阅读明清小说的视野，也要扩大阅读研究明清小说文章的视野，包括国内外的研究论文（外文最好读原文）。这样，一方面触类旁通，易于出新；另一方面，避免撞车，保证自己的发现的独特性，保证出新。

台港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心成立

江苏台港与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心已于1989年12月23日在南京成立。该中心以研究台港与海外华人文文学为宗旨，尤以研究江苏籍的台港与海外华人作家作品为主要任务。研究中心的主任是陈辽，副主任是汤淑敏、秦家琪。

双峰并峙，众脉相连

——从《三国》《水浒》之异、同看两书作者
兼与罗尔纲、王晓家同志商榷

一

《三国演义》、《水浒传》二书的主题曾众说纷纭，其成书年代亦歧意屡见。二书的作者也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有认为均为罗贯中作^①有认为均为施耐庵作^②；有认为系施、罗合作，但又有施年长于罗，为罗师，和罗年长于施，施为罗加工^③，这两种说法；有的则认为二书均非施、罗作^④。本文则试从二书内部——二书之异、同来探讨二书作者的关系，鄙见以为从二书异、同看来是双峰并峙，众脉相连，可以证明二书作者有一定关系，但决非一人。现将管见，具陈如下：

二

《三国》《水浒》异、同之处甚多，谨为概述。

（一）相同处：二书都是“章回小说”，均保留了说话人的特点与痕迹，前有“话说”，后有“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也就是说在成书之前都是有一个民间说唱阶段，人物描写上都是粗线条勾勒，将主要人物放在许多类似的事件中，不断展现他的类似的行为、语言，来连续反复加深刻画人

物性格，二书都强调忠义；片段、场面的具体描绘有多处相类。周梦庄先生在《水浒杂考》（手稿）中曾作了些归纳：

《水浒》书中的痕迹，最显著的与三国演义上名字、笔法雷同的地方很多，如人物名字绰号有小温侯吕方，孔明、孔亮，小霸王周通，操刀鬼曹正等。这些名字皆是后来增添，遗事所载与三国演义暗合处如吴加亮，大刀关必胜，美髯公朱仝。其笔法雷同的如（一）洪太尉步行上龙虎山顶求见张天师，遇道童骑黄牛横吹笛一节情景极似三国演义刘玄德跃马檀溪至水镜庄。（二）朱武、陈达、杨春说：我们学关张刘的义气。（三）鲁智深打禅杖要一百斤重，铁匠说关王的刀也只有八十一斤。（四）晁盖对吴用说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五）公孙胜初入梁山，祭风杀官兵，与孔明借东风相似。（六）秦明攻打清风山，只听得山背上鼓笛之声，秦明纵马来看见山顶上花荣陪着宋江在上面饮酒，这一段俨然似三国演义诸葛亮初用兵，火烧博望坡。（七）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呼延灼摆布连环马，三国演义赤壁有连环计，连环船二事。（八）公孙胜芒碭山降魔，献出阵图，对宋江吴用道：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之法。（九）宣赞向蔡京推荐关胜说：此人乃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生得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十）宋江患背疮，张顺请安道全医治，似华陀为关羽疗毒。（十一）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单廷珪下马投降，极似关羽降黄忠。（十二）行军布阵偷营劫寨与三国演义相似很多。（十三）三国有关、张等五虎上将，水浒写关胜林冲李逵等亦多相象。……互相袭用，尤其是三国演义为最多，据我推测水浒的原本是大宋宣和遗事及民间传说修改增益而成，罗贯中为施耐庵之抄胥，相佐，或施氏死后，将他写三国演义的意识参入，也有可能。章学诚丙辰杂记说三国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似水浒传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等

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于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僚属之间直似水浒传中吴用军师何其陋鄙；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

周先生所云虽未必尽精当，如操刀鬼曹正名字绰号三国未见，秦明打清风山花荣等在山头饮酒，似更类三国之三气周瑜时刘备、诸葛亮在山头饮酒；赤壁只有连环计（即连环船）一事；公孙胜祭风杀官兵，似更类孔明六出祁山时祭风杀劫寨魏兵。《水浒》梁山上的五虎将并无李逵，另外，引章学诚语以为《三国》似出《水浒》后亦难以定论，但周先生所举十余条二书“雷同”者基本皆实，这些，都说明《三国》、《水浒》二书确有许多相类的地方。王晓家同志在《水浒传作者系罗贯中考辨》文中也指出《三国志演义》和《水浒》在思想内容上、艺术手法上、语言艺术上、回目上，结构、情节、结局以及诗词立意风格上等等大量相同之处，如“关云长的忠勇讲‘义气’，很类似宋公明的‘忠义’和讲信用”。《三国》谴责奸臣董卓、曹操，《水浒》则谴责蔡京、童贯、高俅、杨戩等四贼臣。描写人物常用“对比”的手法，如刘备、曹操、孙权三人的刻画，和《水浒》中对三阮的描写相类，对张飞、李逵二书中也有相类的描写语言，如“环眼”“怪眼”等。另外，《三国》开头写张角得天书，《水浒》中也有九天玄女给宋江天书，再如《水浒》中有宋公明一败、二败、三败高太尉，《三国》也有诸葛亮一气、二气、三气周公瑾等等。这些（包括周、王所述）都说明二书确有若干相同处。如果将这两部书比做两座山，可以说它们是有众脉相连的。

（二）相异处：

《三国》、《水浒》相同之处，一时还不易尽列，其相异之处则显而易见。如内容、结构，语言风格均大相径庭。众所

周知，《三国》为描写汉末中国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水浒》则借宋朝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为影子描写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情状。前者多帝王将相写照，后者则多写下层官吏和小民。就结构来说，《三国》类似一株参天大树，主干枝叶，一气浑成，而《水浒》却象若干树木齐植于一园圃中，虽有枝蔓、藤萝使各树“枝枝相复盖，叶叶相交通”^⑤，然而各树木独立之姿，仍可时见，在笔法上《三国演义》多写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的战争场面，《水浒》则在介绍起义者中，夹杂着当时社会风习的描写，人物刻画，也比《三国》稍见细致。至于语言，《三国》可以说是“准文言”，史书中的书面语言气息浓，而《水浒》完全可谓之干净利落的“白话”。二书实是风格迥异，可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

三

笔者认为从《三国》《水浒》异、同看来，重要的是它们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点对考察二书作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正是各书“个性”的显露。

异中有同，在前引的周梦庄先生文章中已可见端倪，周先生列举了十五点，其实细细搜求，远远不止十五点，就如几乎泾渭难同的“语言”来说，仍有不少神似之处，如二书总时常夹杂“诗词”以及说话人的交代、插话、表白等。异中有同，当然是众脉相连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显示着这二部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共同点，并且这些共同点，并不是不谋而合，而是表明二书有着血缘关系。正象血型指纹显示个人的特点一样，显示着二书作者的血缘关系。二书产生的年代相近，又都有取材民间文学的成分，因此不可能不互相影响。

当然，更令人深思和不容回避的是二书的同中有异之处，

这更是研究二书作者“个性”的核心问题。这里仅取二书中“策反”之例来略作分析，如《三国》里的李恢说马超：

马超端坐帐中不动，叱李恢曰：“汝来为何？”恢曰：“特来作说客”。超曰：“吾匣中宝剑新磨，汝试言之，其言不通，便请试剑！”恢笑曰：“将军之祸不远矣！但恐新磨之剑，不能试吾之头，将欲自试也！”超曰：“吾有何祸？”恢曰：“吾闻越之西子，善毁者不能闭其美，齐之无盐，善美者不能掩其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制杨松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若复有渭桥之败，冀城之失，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超顿首谢曰：“公言极善……”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

《水浒传》中类似例子不少，吴用说卢俊义，说三阮皆是，现举吴用说三阮撞筹为例：

吴用道：“小生这几年也只在晁保正庄上左近教些村学，如今打听得他有一套富贵待取，特地来和你们商议，我等就那半路拦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吴用道：“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原来真个惜客好义！我对你们实说，果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知此一事。我如今见在晁保正庄上住，保正闻知你三个大名，特地教我请你们说话。”阮小二道：“我弟兄三个真真实实地并没半点儿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的要带挈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二把手拍着颈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吴用道：“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元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日起解十万黄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今有一个好汉，姓刘名唐，特来报知。如今欲要请你们去

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的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买鱼，来请你们三个计较，成此一事。不知你们心意如何？”阮小五听了说：“罢罢！”叫道：“七哥，我和你说什么来？”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

（《水浒》第十五回）

对比上述二例共同之处都是因势利导，投其所好，晓以利害，都是先不径入正题，掌握对方处境，又以旁敲侧击之法，弄清对方思想，创造良好气氛，然后顺势转入，提出自己看法，使对方赞同自己意见。但是，这两个例子也有骨子里相异之处，如李恢说马超着重在抓住马超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以往的抱负为汉家除残去秽，建立勋业的决心和威震曹营的旧事，而归降刘备正是摆脱窘境，英贤遇明主的必由之路，全忠尽孝，建功立业，皆可实现。核心点在“正统”，吴用说三阮则先深藏己意专注于三阮虽有擎天手段，却只得到个衣食不周的处境，然后进一步煽动他们“义胆包天”的情怀，这样，吴用的“诱良为盗”之计就能一下子叫三阮“上钩”了。核心点在“仗义”。再如“忠义”问题，好象如王晓家同志所云二书都宣扬忠义，其实二书“忠义”的内涵大不相同，特别是“义”，欧阳健同志曾指出二书侧重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⑤，《三国》强调的忠义是君臣大义，唯有这君臣大义才是使顽石点头，猛将解甲的武器，而《水浒》强调的忠义是江湖义气，只有为朋友舍身忘死的“哥儿们的义气”才是草莽英雄杀人越货的催化剂。

四

这些异同能说明二书作者哪些问题呢？我们认为能说明二书作者有一定联系，但决非一人。

(一)二书这么多的地方相同或相互交叉，客观可能性有四：1.可能二书作者本是一人，写两部作品时，很自然地雷同起来；2.可能二书作者互不相识，都根据一些民间传说、话本，进行创作，而这些传说“话本”，原来就有雷同之处，因而二书就有若干“雷同”之处。这些“雷同”也许是偶然；3.可能二书作者互不相识，但相互看到作品而彼此袭用；4.可能二书作者相互认识，写作、交流、修润作品时，有意无意，相互受了影响。对此四点，试一一析之：

前面讲过，二书不仅有多处相同，又有多处相异，相异处更证明是双峰并峙，可见作者决非一人。可见第一个可能是不能成立的。

民间传说“话本”是有雷同之处，但二书并不是传说“话本”的连缀，而是在传说“话本”的基础上的再创作，而从前举各“雷同”之例大多为描写处，很明显系“创作”过程中不断“撞事”，这就不能用素材有相类来解释了。另外，偶然雷同不会有这么多的地方，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可谓多矣，两个互不相识的作家的作品中有数十处相类的似乎还未见到，所以说这是偶然是说不通的，第二个可能也是不能成立的。

会不会相互抄袭呢？我们认为更不可能。因为这两部书都是伟大著作，即使以未经毛宗岗批改过的《三国》和未经金圣叹批改过《水浒》作比较也是如此。既然一个作家能写出这么一整部伟大著作，怎么会有一些片段描写上攫取别人成果而徒自取辱。何况那些片段描写，如洪太尉求见张天师，刘玄德到水镜庄，公孙胜祭风，诸葛亮祭风等均非“空梁燕泥”、“澄江静如练”等可使作品熠熠生光的妙句。所以，借以生光，相互抄袭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我们认为《三国》、《水浒》有这么多的地方相互交叉，

相同，排除了前三个可能，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了，即二书作者相互认识，并且交谊甚厚，在作品写作，交流，润色时，有意无意相互受了影响，并且相互认为这些影响是不足为病的，特别是在相互润色时，不知不觉的流露出“看家本领”，带出了自己熟悉的社会关系，口头禅等，就好象使惯了刀的，即使拿着枪也会当着刀使起来，并且有时还用刀法来使枪。所以，这些情况的产生，极大可能是二书作者是两个不仅相互熟悉，而且交谊颇厚的至交。

（二）两部书“双峰并峙”就能证明两部书的作者是两个人吗？我们认为“双峰并峙”，是指两部书的艺术风格不同反映了两个作者艺术个性的不同，这艺术个性的不同，尽可证明作者是两个人。

《三国》虽也有“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等口头套语，但从整个文字风格来看纯属文言，既非行车卖浆者流写的，也非给行车卖浆者流看的，大类于《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而《水浒》就语言来说“之、乎、者、也”是几乎没有的，其内容虽也有帝王将相，但更多市井情况，并且帝王将相生活写得很粗疏表面，而市井小民的情况则写得细致而生动，似乎是熟悉小民的人写给小民看的。当然，单从作品“语言”，还难以断言作者为二人。因为文言写得炉火纯青的蒲松龄，以《聊斋》登上了文言小说大师的宝座，可是蒲松龄不是也写了与《聊斋》语言风格迥异的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吗？首先，《醒》是否为蒲著还有争议，即使确为蒲著，只能证明蒲的多才多艺和勇于探索，亦如鲁迅先生既是白话小说大师，也发表过文言小说。其次，更重要的是《醒》只是《聊斋》的演绎，只是“语言”大不同于《聊斋》而不是整个风格迥异于《聊斋》。

（三）《三国》、《水浒》的不同，会不会不是由于作者的不同而是由于题材的不同而形成的呢？我们认为不然。一个作家，特别是大作家，不管写什么题材，总有自己一以贯之的东西，会在作品中反复强调，这是艺术个性的逻辑，是决不会违背的。如托尔斯泰，他的取材于现实的《复活》也好，《安娜·卡列尼娜》也好，取材于历史的《战争与和平》也好，都贯穿着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契柯夫上千篇各种题材短篇小说，都浸透着对庸俗的嘲弄与抗争，鲁迅的取材近现代的《呐喊》、《彷徨》和取材取自远古的《故事新编》不是都贯穿着揭露统治者的愚昧、丑恶和同情人民苦难生活的红线吗？而就《三国》《水浒》来说，它们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不同的，《三国》强调正统，为了正统，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强调贤君良臣团结一致，事业就兴旺。《水浒》则强调的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官逼则民反，而且只有一反到底，才能有生路。

一以贯之的不同，又会不会是由于一个作家的思想发展，有了新的开掘而形成的呢？章太炎不是早年是打倒孔家店的将帅，而到晚年却又成了尊孔的坛主吗？我们认为《三国》、《水浒》情况大不类章太炎的反孔、尊孔的文章。因为这两部书产生时代基本接近，均是对某一社会全貌的概括，而不是对社会某一问题（如尊孔、反孔）的研讨发掘，一个作家对社会全貌、对生活可能也应该有新的发现，但不会在几乎同时代的二书里有信念的对立或相异（象刘半农、钱玄同演双簧戏，那是例外）。例如二书对忠义的看法，我们前已论述，虽都是强调忠义，但《三国》多次强调的是君臣大义；而《水浒》则强调的是江湖义气。这不仅可从李恢说马超、吴用说三阮这个例子看出，二书可以说只要是涉及忠义，莫不如此。如《三国》张辽劝关羽投降曹操，书中特别列入一个回目“屯土山关公约三